



毛泽东与《三国演义》情结

李金坤



江苏社会科学讲座

158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尤其酷爱阅读历史著作。早在家乡韶山的私塾里,他就已通读过《左传》、《史记》、《纲鉴易知录》等。在长沙求学时,他又自学了《读史方舆纪要》、《资治通鉴》等书。进京后,毛泽东菊香书屋的藏书已达数万册,其中,历史典籍占较大比重,诸如《春秋》、《左传》、《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历朝的“纪事本末”、《四库备要》、《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读史方舆纪要》、《清史稿》等,一应俱全。一部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全部通读过,好多册的封面及内页却已磨破。1975年病魔缠身时,他又重读《二十四史》,书面上留有“1975.8 再阅”、“1975.9 再阅”等字样。直至他辞世前半个月,他还向秘书索要历史笔记小说《容斋随笔》。毛泽东一生如此重视学习史学著作,其目的即在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泽东认为,无论指导中国革命还是搞社会主义建设,都需要懂得历史。1958年,他向全党发出“学点历史”的口号,要求每个革命者“不单是懂得珍惜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还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如何学习与继





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毛泽东曾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一生爱读《三国演义》的深厚情结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回忆其少年时代的学习情况。他说:“我读过经书,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从毛泽东这段充满深情而意味浓郁的回忆中,少年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是何等的痴迷与钟情。小说中那些充满聪明与智慧的英雄人物,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的印记是多么的深刻而恒久。正由于少年毛泽东这般“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赤诚情怀,因此在他后来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他都能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那种“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与“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浪漫主义英雄气概。这些与他少年时代崇拜《三国演义》等系列英





雄人物的见贤思齐的向善美德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毛泽东一生钟情于《三国演义》,这恰恰体现出《三国演义》人才思想、统筹思想、尤其是军事思想上的博大精深与无穷魅力,同时也表明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善于学习与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精神。正如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对贺龙、徐海东等人所说的那样:“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书,谁就不算是中国人,或者只能算半个中国人。”此话说得似乎绝对了点,但却正好表明了毛泽东一生对《三国演义》等小说非常钟情与挚爱。

由史学与文学之区别体现敏锐的学术眼光

毛泽东指出:“《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啰!”就真实性问题,毛泽东分别就诸葛亮与周瑜的年龄问题,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他认为:“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龄大。这可能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37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7岁。”从年龄差异这个角度考察可知,周瑜大于诸葛亮是《三国志》的真实记载,而诸葛亮大于周瑜则是《三国演义》文学撰写的需要,这显然是虚构的,于史实无涉。毛泽东能从《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对诸葛亮与周瑜年龄差异的对比中,敏锐地发现《三国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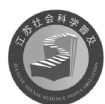




义》与《三国志》因文体不同而出现的不同叙写事实,体现了毛泽东深厚的文史功底与独到的学术眼光。

毛泽东敏锐的学术眼光还体现在对曹操的具体评价上。《三国演义》小说与“三国”戏剧舞台上的曹操,历来都是遭贬的“反贼”、“奸雄”,是与“智绝”诸葛亮、“仁绝”刘备相对应的“奸绝”,是白脸小丑式的“奸臣”。总之,小说、戏剧中的曹操是道德败坏、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天字第一号大奸贼,故而甚至出现了观众不忍舞台上曹操的绝顶奸诈行为而愤怒殴打演员的地步。然而,毛泽东则站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三国志》中的曹操形象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指出:“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曹操统一中国北方,……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鲁迅对于曹操也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两位伟人对曹操之评价,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们才真正是曹操难得的异代知音!

《三国演义》之所以将曹操定位于“汉贼”、“奸雄”的霸政代表,而将刘备定位于仁君的仁政代表,这是由于作者罗贯中“帝蜀寇魏”拥刘反曹的封建正统观念所决定的。作者就是要通过对刘备之“仁绝”与曹操“奸绝”鲜明而强烈的对比,凸显他的政治观念与道德理想,从而体现“尊仁政”而“抑霸政”的主题思想。毛泽东对此有





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罗贯中“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除了受“汉室正统”的传统观念影响之外,还因为“继承了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毛泽东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辩证法思想来具体分析《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产生的原因,甚切实际,是颇具学术眼光而令人信服的。

毛泽东不仅极其崇尚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而且还十分仰慕具有杰出诗才的曹操。毛泽东经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工作边休养期间,常常在北戴河海岸沙滩漫步时吟诵曹操的《观沧海》。夜晚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低声吟诵《观沧海》。有一天,适逢下雨,海滨风浪很大,毛泽东不顾卫士长李银桥的劝说,仍坚持下海游泳,并且说:“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于是,毅然下海畅游了一个多小时。次日,毛泽东面对大海,遥想千年前的曹孟德及其《观沧海》,喜看“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壮怀激烈,遂一气吟成了《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词云: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很显然,毛泽东此词与曹操《观沧海》都是“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杰作。比较《浪淘沙》与《观沧海》,前者受后者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谓是现代版的“《观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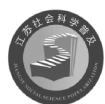


善于学习《三国演义》的战略战术军事思想及人才思想

毛泽东一生喜爱《三国演义》，他是从军国大事的角度去理解、感悟和运用《三国演义》的教育意义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视《三国演义》为兵书，从中汲取丰富的军事思想营养。毛泽东在 1936 年 12 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中，结合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际，就有关战略防御原则问题深刻分析道：“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案例是非常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此所列的六个以弱胜强的战例中，《三国演义》中就着重描写了三个，可见印象之深刻。在《论持久战》这篇军事名著中，毛泽东十分辩证地分析了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如何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的道理。他说：“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人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这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上列毛泽东有关“以弱胜强”的军事思想，都明显烙有《三国演义》中“以弱胜强”军事思想的印记。

（二）视《三国演义》为举贤书，从中吸取重视与选用人才的思想良方。在对《三国演义》的反复阅读中，毛泽东深切体会到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郑重指出：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生动选人用人事例,为现代的组织人事工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作用。毛泽东曾对薄一波说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这是以《三国演义》为例,说明真正的人才要善于搞好团结与协作,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好人才效应。毛泽东还列举《三国演义》中著名的“三顾茅庐”的故事,说明重视人才和用好人才的重要性。他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可见,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中人才思想的学习、借鉴与吸收是相当用心而见成效的。

(三) 视《三国演义》为政策书,从中采纳政策与策略的思想精华。1941年1月,我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共产党内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在如何对待蒋介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意见分歧甚大。有人认为与国民党的联合已经彻底破裂,毫无希望,强烈主张对国民党从政治上、军事上立即予以全面反击。在这十分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头脑冷静,认清形势,一切从大局出发,从中国光明的未来出发,将阶级矛盾力置于民族矛盾之下。在一次形势报告会上,毛泽东以《三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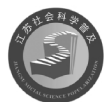




演义》中诸葛亮的联吴抗曹的战略为例,分析与强调了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他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的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吸取刘备忽略主要矛盾而攻打吴国的惨败教训,分析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结果很快统一了全党对皖南事变的认识。一致认为,大敌当前,应以民族解放利益为重,不计前嫌,顾全大局,坚持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而它的这一思想源泉,正是来自于《三国演义》。

毛泽东一生喜爱读书,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取得了很好的古为今用的阅读效果,这在对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思想精华的接受方面尤为突出。毛泽东能够正确区分史学巨著《三国志》与文学著作《三国演义》的不同文体性质,认识到《三国志》的真实性与《三国演义》虚构性的叙述特征的本质差异,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辩证思想来具体阐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产生的原因。毛泽东不仅崇尚曹操杰出的政治家才干,而且还仰慕他非凡的诗人才华,化用曹操《观沧海》诗的雄阔意境而创作了豪气满纸的《浪淘沙·北戴河》词。他十分自觉地从《三国演义》中汲取丰富的军事思想营养,吸取选用人才的思想良方,采纳政策与策略的思想精华,为我所用,用而见效。从毛泽东对





《三国演义》文化精神的自觉接受过程中,我们由衷敬仰一代伟人注重承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精神与好学美德,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不朽而神奇的魅力。

(本稿由镇江市社科联推荐)



李金坤,1953年生,江苏金坛人,文学博士,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从事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30余年。中国屈原学会等多家国家级学会理事、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常务理事、镇江市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出版专著(参著)20余部;在《文学遗产》、《经学研究》(台湾)、《人文中国学报》(香港)、《国际言语文学》(韩国)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6项,获国家、省、市各级社科优秀成果奖20余项。

